

高教动态

2018年第5期（总第80期）

江苏大学规划发展处（教育教学研究与评估中心）编

2018年10月30日

<http://gjs.ujs.edu.cn>

责任编辑：尤俊英

★高教新闻

- 多部门联合专项清理“四唯”现象.....2
- 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教40条”.....2
- 亚洲大学排行榜出炉：港大、清华、北大等榜上有名.....3
- 6所顶尖名校获批建设前沿科学中心.....3

★教育教学

- 提升大学质量的基本路径.....4

★高教视点

- 双手双脚赞成不唯学历不唯论文，关键是唯什么？.....7
- 新时代高教40条：重拳频出，能否治好本科教育这些“病”.....9
- 教育及科研体制的根本性问题，不应只在诺奖季探讨.....12

★热点评论

- 高校千分之一的淘汰率算是“严出”吗.....13
- 中国大学搞“宽进严出”，可行吗？.....15

★改革探索

- 上海理工大学：推出师生学术共同体交流计划.....17
- 扬州大学：“翻转课堂”对接智慧教学.....18

编者按：

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立命之本、发展之本，本科教育要回归初心、以本为本，为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教育部近日印发了“新时代高教40条”，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为治理在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院士评选等科研活动中“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现象，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联手开展“四唯”专项清理行动。

近期，教育部等部门重拳频出，坚信随着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四唯”行动的实施，本科之根扎的更深、更牢，人才评价的一些乱象可以得到根治。

★高教新闻

多部门联手专项清理“四唯”现象

长期以来，“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现象在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院士评选等科研活动中盛行，饱受诟病。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24日联合发出通知，开展“四唯”专项清理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等六部门圈定了自己的行动重点和范围。除了清理范围外，通知还确定了“四唯”现象的清理方向：其一，对部门和单位政策文件中涉及“四唯”的规定进行修改；其二，对各类考核评价条件和指标中涉及“四唯”的内容进行调整，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手册、评审细则等。其三，对有关管理信息系统和工作表格中涉及“四唯”的内容进行修改。

此次专项清理，各部门和单位根据各自职权，自行开展清理，形成整改报告，于11月12日前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五部门将对各部门、各单位清理情况进行督促指导、梳理总结，确保落实见效。（摘自：中国教育报 2018-10-25）

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教40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新时代高教 40 条”）等文件，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新时代高教 40 条”指出，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是本，本科教育是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本为本”，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同时，为实施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教育部与相关部门还印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等文件，对文、理、工、农、医、教等领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做出具体安排，明确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的总体思路、目标要求、改革任务和重点举措。在系列卓越拔尖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1.0 的基础上，通过拓围、增量、提质、创新，扩大了各个计划的实施范围，增强了各项改革举措的力度，提升了改革发展的质量内涵。（摘自 教育报 2018-10-18）

亚洲大学排行榜出炉：港大、清华、北大等榜上有名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 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 QS）公布 2018/2019 年亚洲大学排行榜，新加坡国立大学重登榜首。

据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最新的 QS 亚洲大学排行榜中，取代去年跃升第一的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今年下滑两个位置，排名第三。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的香港大学，晋升三个名次。随着新加坡国立大学今年跃升 QS 亚洲大学排行榜首位，它在全球大学排行榜的排名也从第 15 名上升至第 11 名，南大的排名则滑落一个位置到第 12 名。

此外，清华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并列第三。北京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的排名也有所进步，分别从第九名和第七名上升到第五名和第六名。（摘自 中新网 2018-10-24）

6 所顶尖名校获批建设前沿科学中心

10 月 25 日），教育部同时下发 6 个文件，决定对 6 所顶尖名校的 6 个前沿科学中心进行立项。这 6 个前沿科学中心分别是：清华大学量子信息前沿科学中心、北京大学纳光电子前沿科学中心、浙江大学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四川大学疾病分子网络前沿科学中心、天津大学合成生物学前沿科学中心、同济大学细胞干性与命运编辑前沿科学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大学“脑科学前沿科学中心”已经在今年 4 月获得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珠峰计划”首个前沿科学中心。本次教育部再次立项 6 个前沿科学中心，意味着这一重量级科学中心将在高校中逐步落地进行立项建设。（摘自 教育部网站 2018-10-26）

★教育教学

提升大学质量的基本路径

大学质量当然是我们对大学的一种基本评价尺度或期待。大学质量作为一种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程度，意味着大学质量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矛盾和统一。

大学质量的根本在于满足不同个人及层次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这种说法比较抽象，实际上我们的大学教育更多的是一种被引导的需求，换言之，实际上我们还是只能站在大学本身所能提供的教育需求的满足程度来评价，只能站在大学作为主体方面来衡量而不是站在客体本身。大学质量当然是体现大学要件的质量，构成大学要件的因素当然有很多，包括大学的定位、学科水平、办学条件等，但无疑人是一切中最重要的。从人这个核心因素来看，大学的要件毫无疑问包括三个方面：教师、学生和大学行政。由此，大学质量的根本就表现为教师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质量和以大学校长为中心的行政质量。

一、教师的教学质量

大学教学质量首先体现在教学中，教学质量乃是大学教育的根本。这样说并不是排斥大学科研，大学科研与研究所的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不同就在于，大学科研始终和教学联系在一起，大学教学本身就内含着对大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引导与培养。之所以把大学质量的中心锚定于大学教学，是因为就以育人为中心的大学的质量而言，大学科研水平的检验与落实，最基本的途径还是在教学。大学教师教学的质量，内含着对大学教师科研的要求。

大学教学的质量，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教师本身的素养；二是教学设计或教学过程的安排。

教师的素养包括两个方面：一为知识的准备，包括大学教师的科研水平与相关知识储备；二是教学艺术的准备。就前者而言，大学以大学问为基础，教学以研究为基础，这早已是大学的通则，自不必多说。我们在此强调的是，教学是一门艺术，大学教育当然同样如此，尽管大学教学与中小学教学应该有所区别。作为艺术的大学教学需要磨砺，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种实践德性的发展需要经验。这实际上即大学教师这种师徒制、见习实习制的思想渊源。一个人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并不一定适合马上走上讲台，还需要优秀教授的传、帮、带，即我们所说的先打打下手，感受、理解大学教学过程，特别是学生学习过程的复杂性，学会与学生相处，这乃是大学教师必要的准备。年轻教师大学教学技术的磨砺与艺术的领悟，实际上是一种大学精神在一代代大学教师手中薪火传递的过程。细心的感悟优秀教授的教学魅力，逐渐开启个人的教育智慧，这对于提高一个新的大学教师的教学水平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想当初，章太炎先生授课，须得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

就关于教学过程的安排与教学设计而言，大学教学的基础性特质乃是对知识的自由探究，

这是至关重要的。以自由探究为基础的大学教学过程的开放与自由，才真正体现大学不同于中小学的独有的魅力，这种魅力是由深厚的学问根底与卓越的人格显现出来，在此教学过程中发生大学师生心智的敞开，达到历练生命品格的要旨。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授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这种授课形式，显现的无疑是教授的底气，实际上也是大学教授尊严所在。这其中包含的对知识、对教学之道的了然于胸。或许，这才是大学教学真正的魅力之所在。

据说当年康德在哥尼斯堡讲学时，一个人搬条凳子，偶尔讲一句，不知他下一句怎么讲。你们就在下面慢慢的等吧。当台下的学生静静等着康德下一句话时，这其中体现的是康德作为大学教授的一种从容的气度。当大学教学被各种评价指标所规定的时候，大学的精神早已不在。大学教学的平庸化，同样也在情理之中。

二、学生的学习质量

大学生的学习应该如何定位，和中学生的学习有什么不同，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大学生的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开放性，即对更高知识的追求、对探求对无限的渴望，惟其如此，才能把大学生引向不断的思考超越，从而获得心智的卓越，这才是大学质量的根本标志。大学之根本在于培养人，培养完整人格、心智卓越的人。所谓因真理得自由，就是凭借对真理的自由追求获得自由而高贵的人格，这是大学质量的落脚点。那么，大学生的学习是如何实现的呢？

当然首先是在大学教授引领下的学习，是被引导的学习，这意味着大学生的学习首先需要进入大学精神的领悟之中。大学生必须敞开自我、感受大师或大学的精神气质，并融会到个人的生活意向之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主动学习、自主探究的意向。广博的学习、深入的探究、独立自由的思考，这是大学生学习能力的三驾马车，大学生的学习应是锻造自我人格的基本形式或实践。广博的学习，无疑扩展了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其人格内涵的丰富性。深入的探究，这是让其进入世界的深处，提高个体人格的深刻性。而自由的思考这是在广博的知识与深入探究基础上形成的个人如何面对他人与社会、面对权威与秩序，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姿态，他直接指向的是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增强大学生的人格独立自由。在这里，大学生人格的发展经由广博学习、深入探究而在自由思考中完成。

就目前而言，大学生的学习能力有三点比较重要：一是个人的学习风格，业绩每个人怎样认识自我、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与学习方法。二是资讯或信息素养，这是一种面对信息化社会的基本能力。如何提高个人的资讯素养、提高个人应对信息社会的主体能力，从而使个人

不被信息社会所淹没，避免大学生的自我迷失，这是当前大学生的必修课。三是生涯与发展规划，大学生学习应该立足于生涯发展的意识与能力。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积极性的发展，立足于个体人生的发展，有效、妥切地安排大学学习与生活，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意义重大。当然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意识有赖于他们在中小学阶段所经历的教育，可见对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关注有赖于我们对一个人在整个教育历程中学习能力培养的系统关注。

三、大学校长的行政质量

大学的行政同样也有质量的问题。如果说大学教师的质量是基础，学生发展的质量是根本，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大学行政的质量是关键。

大学行政的中心是校长，大学校长不仅仅是行政事务的中心，更是大学精神的中心点，换言之大学校长不仅仅是一种权利的符号，更是大学之哲学精神的出发点，是大学校长以大学的哲学或者理念为大学赋形，给与物质的大学空间以灵魂和内在的秩序。由此可以看出，大学校长的任务是双重的。大学校长不仅是大学行政或权力人，更是大学哲学人。大学校长的存在方式，不仅是作为大学权力的实践者，更是大学哲学的实践者。大学校长需要以大学哲学的实践，来保障大学权力实践的正确方向，避免大学权力的堕落，沦为世俗利益博弈的工具。这意味着大学行政权力必须有大学之道的内在支持，从而避免大学权力的偏失，以大学之“道”对抗大学之“势”，一旦大学之“势”掩盖大学之“道”，大学就完全成为世俗利益的工具场，大学的平庸与堕落就成为必然。

这里涉及大学校长的选择、任免问题。大学管理的经验来源于对大学治理的深切理解与认同。依照国际惯例，大学校长的任免必须慎重，不是随便哪个官员就可以担当大学校长的。大学校长必须选择那些深谙大学之道的人，是他们的人格与智慧给大学以超越世俗的大学品质，从而避免大学存在的庸俗化。大学的体制需要大学校长的人格支持，实际上亦即大学需要大学的哲学来支撑，蔡元培无疑是大学校长的杰出典范。

就目前而言，要真正提高我们的大学质量，在现有条件下，无疑大学校长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学中有一个说法，劣币驱逐良币。一位好的校长无疑是一所大学的标志，他（她）将起到引领方向、团结人心、凝聚学人的积极作用。同样，一位看不清大学发展方向、缺少足够的大学智慧的校长只能在权力的沉醉中迷失大学校长的使命，而使得整个大学陷于迷失之中。

附录：大学质量工程：提升质量的坦途还是葬送质量的坟墓

事物的复杂性都远在我们的理智设计之上，这意味着我们对任何事物促进的外在措施都需要审慎。从亚里士多德到伯克，到哈耶克，之所以如此推崇审慎的美德，根源就在于此。包括中国古典智慧中所言的治大国若烹小鲜，道理如一。这实际上决定了工程思维的局限性，即任何“工程”都可能对事物内在复杂性的简约化，从而当工程思维泛滥时，往往会直接导致对

事物内在秩序的颠覆，从而使得“工程”达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在一个浮躁的社会中，“工程”此起彼伏的结果往往是人们疲于奔命，劳命伤财而结果不佳。

大学质量工程就是近年来在各种大学工程之后的又一“工程”举措。这个工程的出发点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在目前大学官本位体制之下，大学质量工程的结果是，大学的好坏等同于适应大学质量工程项目的好坏。所以，“工程”之下的诸多大学，自然地就把在质量工程中分一杯羹作为首要的目标，在全力适应大学质量工程的需要之时，就把大学自身真正的质量的提升付之高阁，倾一校之力，用尽各种功夫，从各种工程中去争几个项目，有项目就有了成绩，有了成绩就有了一切，而大学质量的实实在在的提提高则根本就不在大学工作的中心之上。一个原本以提高质量为目的的举措，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质量的坟墓，这不能不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今天的大学，都以搞项目为重点，为光荣，上面给出项目，下面倾力而为，大学不再是大学人自身沉静地在追求学术精神的过程中获得大学内在秩序的合理化，而是统计表上的数字的繁华。大学在一片喧嚣与热闹之中，早已越来越多地成了项目与工程的奴隶。这样的大学何来大学的精神与气象？（摘自：江苏高等教育网 2018-10-23）

★高教视点

双手双脚赞成不唯学历不唯论文，关键是谁什么？

10月23日科技部等多部委发布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如同一道巨大的闪电般闪耀天际，让不少人看到了光明，感受到了温暖，同时也有些目眩神迷，辨不清方向。

值得高兴的是，中国的科研高校界从此在人才评价体系上也出现了一个“四唯”的专属名词，同样的称谓出现在近几年关于我国干部队伍建设中，即“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的四种不良倾向，众所周知，干部选用和任命体系是一个国家能够可持续发展，实现振兴的基础，以此比对，起码能够充分体现国家对于科研人才的高度重视。

应该说，学术“四唯”所造成的在人才评价上的极端，造成了科研机构、高校用人引人方面的片面化，产生了诸如高校“抢帽子大战”这样的问题，而论文泛滥不能完全体现科研成果的水平 and 价值，反而浪费大量的资源，还出现了个别高校年终考核要求人人一篇SCI，不合格就扣绩效，以及有的科研人员通过开放式数据源成为专门钻营数据模型的“论文写手”这样的荒唐事。更要命的是，有的科研人员为了完成年度考核工作量、挣年度SCI论文“工分”，不愿去做那些周期长、有原创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的课题，而是挑容易出论文的短平快课题。还有少数科研人员迫于职称晋升、业绩提升等压力，搞论文造假、抄袭或代写，破坏了学术生态。可见“四唯”的确问题很多，清理“四唯”算是在科研人才评价体制机制改革中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当然也有不明就里的群众叫嚷，如果不唯论文、学历、奖项等这些可以量化的标准，难道

在选人用人上要唯领导、唯人情、唯家族、唯门路吗？看，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断了，我们说不唯论文并不是论文不重要了，而是要在评价机制上更加多元化，就如同在干部队伍建设上所破除的“唯票”一样，并非不重视民意了。当然，铺天盖地类似的评论或者牢骚看多了，说明的确造成了一些人的思想混乱，倒是觉得有些事情有讨论的必要。

说白了，不唯论文、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奖项，我们应该唯什么，或者换一个说法，按照二八理论，总要有一个核心标准，那是什么？

先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现在西湖大学的校长施一公在参与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他以前曾经预测，中国会在2020年论文数超过美国，没想到提前完成了，对此他很担心，在他看来，论文多不足以说明科技实力，我们的论文数量超过美国，也不能说科技实力就超过美国。他认为，如果要提建议，就是应该进一步改进科学评价体系，这需要全社会达成一种共识。

大部分媒体在发布这篇新闻的时候，标题大都是“施一公炮轰中国论文，垃圾太多”或者“施一公炮轰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等，在这个一看题目就不看内文的时代里，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另外两个细节。一个是他坚决反对“论文无用”论，施一公表示“没有论文，怎么能有科学技术”？还有一句也是最值得玩味的话：“说实话，我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为什么他说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虚话，也深谙其中之理：数字指标很重要，这是矛盾的两方面，如果没有这些标准，如何反映科研的质量，但有了这些标准，大家拼命‘做’这个数字怎么办？

这是暂时无解的一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则是国际通行做法，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未来海外人才引进，原因很简单，海外的中国学者是按照海外的评价标准，而我们现在要改弦更张，如何在引才的时候去对接和评价？

科学没有国界，很多人拿来用在科技交流和引进上，其实这句话还隐藏着一个非要重要的意思，那就是如果想要借鉴国际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并培养出国际认同的科研人才，就必须引入国际通行方法，如同两种不同型号的铁轨肯定无法对接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再根据本国的情况进行落地。

那么国际通行做法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公理之下的，第一，研究成果和科研水平是由科学共同体认定的，第二，论文是学术研究的通行货币。第三，头衔（就是我们所说的帽子）是经过严肃认定之后，所体现在科学共同体中的阶层和权威。

如果你明白了这三个公理，你就明白为什么会“唯专家”，因为国际通行的方法就是参考国际最顶尖专家的观点，也就是通常说的同行评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连美国学术高校界很大程度上都是“唯论文”，也能明白为什么“帽子”这么重要。

那么，你会问，难道国际通行标准就是对的吗？这当然不一定，但如果90%都是如此而且有的国家如英美还取得很大的成功，那么我们就要反思，是规则本身有问题，还是我们这里有

什么阻碍了规则的落地。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先生发了一段文字让我很受启发，他是这样说的：“新出了一个名词，四唯。即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励评价人才。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评价方式？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比较显性，客观公正。就如学生用分数评价一样，不一定科学合理，但公平。解决四唯，最后还是需要解决公平的问题，一旦不拿这些尺子量人，很容易出现舞弊，怎么办？舞弊的背后，是诚信，是规矩。如果能保证，大家都支持。”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我个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论文职称学历奖项都没有罪，我们现在所依据的只是在执行过程中掺杂了徇私舞弊的恶习。有的职称靠做假和关系评定的，有的学历水分太大，是混出来的，有的科研项目是有关系拿来的项目资金，对科研没有任何作用。有的奖项是形式主义，花钱买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反对论文，只是反对垃圾论文，我们不是反对学历，而是反对学历造假，我们也不是反对职称，而是反对职称靠关系评定……

因此，我们在反对“四唯”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如何营造良好的学术气氛，构架健全学术诚信体系以及核查体系，并排除掉类似于学术阀门这样的近期繁殖等问题。

回过头还是来说标准，清理“四唯”的文件中提出：目前的导向是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品德看不见摸不着，能力如果不能量化就没法对比，业绩是什么呢？从科研角度来说应该还是取得科研成果之后的高水平论文吧。

任何事情，破很容易，但立很难，特别在建立中国特色人才特别是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和中国特色建设“双一流”的过程中，用在刀尖上跳舞来形容并不过分。

那是因为标准问题至关重要，即便以清理“四唯”为例，这个尺度在哪里，什么样才叫唯论文、唯学历、唯职称、唯奖项，其实也需要有个标准，否则在具体落实的时候会出现偏差，甚至有可能出现极大地偏差。当然，任何探索和改变都会存在风险和多种可能，但只要是做了就是进步，只是希望有关部门在宏观层面能够尽快出台更加细化可以量化的人才评价标准，哪怕是指导意见，而不仅仅是道德、能力、业绩这样比较虚化的内容，还是那句话，指挥棒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不察也。（摘自 中国教育在线 2018-10-30）

新时代高教 40 条：重拳频出，能否治好本科教育这些“病”

打游戏、谈恋爱，考试随便应付下就“及格万岁”，甚至“多一分都是浪费”——这种被一些人视作“幸福”的大学生活即将成为追忆。

光明日报 10 月 26 日报道，近日，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新时代高教 40 条”）等文件，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按照意见要求，全国高校将开展“集体行动”，严把毕业出口关，加强过程考核，取消“清考”制度，并对教师评价等“指挥棒”进行调整。

“一部分学生天天打游戏、睡大觉、谈恋爱，一部分教师（不是极少数）‘认认真真培

养自己、马马虎虎培养学生’，一部分学校对本科教育‘领导精力投入不足、教师精力投入不足、学生精力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足’的所谓‘好日子’应该也必须一去不复返了。”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强调。

记者注意到，“新时代高教40条”提出了高水平本科教育的总体目标：5年后建成一批立德树人标杆学校、一批一流本科专业点；到2035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这也是继2018年6月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之后，教育部针对本科教育改革首次给出的清晰时间表和路线图。

重拳频出，要治中国本科教育的哪些“病”？具体开出了什么“药方”？各方反响如何？

问题 学生不爱学，本科四年成“放羊”

对策 加强过程管理，文凭难“混”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将18名学分不达标学生从本科转到专科一事，引起公众极大关注。

“现在大学里，有些学生醉生梦死，这样是不行的。”吴岩告诉记者，本科教育的一个思路就是大学要合理“增负”、严把出口关，“适度增加不能按时毕业的学生是应该的，本科生有一定的淘汰率也是必然。”

记者发现，“严格”成为此次“新时代高教40条”为本科教育改革明确的一大方向。

比如，在考试管理上，将“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要求“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针对以往有反映就是“走过场”的论文答辩环节，提出“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对形式、内容、难度进行严格监控”。同时，在考察形式上，强调要“综合应用笔试、口试、非标准答案考试等多种形式”。

“这意味着平时成绩会更加重要，以往那种平时不学、考前抱佛脚的学习方式将行不通了。”清华大学学生刘华宁告诉记者。

但在严格管理背后，中国本科教育一直以来的短板还在于“如何让学习真正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能”。

吴岩告诉记者，要实现“增负”，并非是增加课程的量，而是以提升学生质量为目的，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记者注意到，围绕这一点，“新时代高教40条”也作了相应的政策设计。比如，探索将辅修专业制度纳入国家学籍学历管理体系，允许学生自主选择辅修专业；推动健全学分制收费管理制度，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辅修课程等。具体到课堂教学上，则提出要“大力推进智慧教室建设”“积极推广小班化教学、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

“这对学校的课程设计和老师的课堂讲授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今后的本科教育课程要更

多地在难度、深度和挑战度上做文章。”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唐斌如此解读。

问题 老师不愿教，不爱讲台爱科研

对策 突出教学激励，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

将被“严格要求”的不只是学生，还有老师。

记者注意到，“新时代高教 40 条”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篇幅放在了“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上。这也是瞄准了此前一直困扰本科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顽疾”——老师不愿教书，不爱讲台爱科研。

“国家推出‘双一流’计划已近三年，时至今日，一些高校对‘双一流’中一流学科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一些显性指标上，甚至把学科等同于科研。为数不少的高校认为，只要教师科研做好了，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作为科研生力军能出成果，实现‘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就不远了，本科教育成为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的陪衬。”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表示。

“教学成绩难以量化，不少高校把教师上了多少课时只是作为职称晋升的‘及格线’，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项目数、论文数。”北京某高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师告诉记者，如果“指挥棒”不调整，这股“教师不爱讲台”的“歪风”就很难刹住。

记者发现，此次“新时代高教 40 条”对教师评价体系作出了不少具体的调整，包括加强教育教學业绩考核，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中施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加大对教学业绩突出教师的奖励力度，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绩效考核和津贴分配中把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作为同等重要的依据；对主要从事教学的工作人员，提高基础性绩效工资额度，保证合理的工资水平等。

与此同时，“新时代高教 40 条”还要求，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强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全面开展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等，全方位、多渠道地提升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能力。

但在采访中，也有一些教师对“新时代高教 40 条”的实施效果表示了疑虑。

“‘新时代高教 40 条’制定比较宏观，关键要看这种‘同等重要’怎么落地，要有具体政策。”上述那位不愿具名的教师表示，此前其所在高校也出台了类似“一票否决”制度，但对教师积极性的调动作用并不显著，“大家还是把教学当成一条‘及格线’，下大力气拼抢的还是科研。比如在津贴分配中，一堂课课时费 200 多元，发一篇核心期刊 800 元，还在职称晋升时额外加分，这种差距不拉平，导向就很难形成。”

问题 高校少自省，质量文化待完善

对策 培育质量文化，强化高校主体意识

在建设高水平本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记者了解到，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高校广泛开展了质量评估和专业认证工

作。截至目前，先后有 1100 多所本科高校、800 多所高职院校接受了评估。但这一过程中，也并非没有短板。

“一是忽视了高校的质量主体地位，质量标准由政府制定、评估由政府组织，高校只是评估的被动执行者和质量保障过程的被实施者，缺乏自身办学质量的思考和把控，即便有，也是只说好不坏。二是现在各种质量工程使得高校把工程要求作为质量标准，忽视了自身办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质量建设的短期化和功利化。”一位长期从事高校质量评估工作的专家告诉记者。

在“新时代高教 40 条”中，“加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部分着墨甚多，并着重强调要“强化高校质量主体意识”，各高校要“建立本科教学自我评估制度”，“将评估结果作为校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向社会公开”。此外，还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形成覆盖高等教育全流程、全领域的质量监测网络体系；推进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认证工作，开展保合格、上水平、追卓越的三级专业认证。

“高校不仅要设计标准、学会如何为自己‘打分’，还要让这种质量文化观成为深植在每一位师生心中的标准，而不是依附于外部评估。”有关专家表示。

“除了高校自评外，‘新时代高教 40 条’还把评估、认证、督导等工作置于质量文化之下，让其为高校质量文化生成发展服务。”教育部评估中心院校评估处处长刘振天认为，必须改变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外在性和技术性，使质量真正成为国家、社会、高校以及师生等每一质量主体的内在成长需要，“质量文化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质量评估、认证、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这种影响是内在的、长期的、稳定的”。（摘自 光明日报 2018-10-26）

教育及科研体制的根本性问题，不应只在诺奖季探讨

2018 诺奖再次引发人们对国内基础教育和科研体制根本性诟病的鞭挞。而彻底改变这些需刮骨疗伤的勇气，并非只是蹭蹭诺奖季热度即好。

又一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陆续公布成了整个科学界的盛事。然而，三大奖项今年中国科学家再次无一斩获。迄今只有屠呦呦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取得的骄人成绩。包括获 201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从 2001 年以来的 18 年，日本已经有 18 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三项自然科学奖。算上此前以汤川秀树 1949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发端，到 2000 年日本已经有 6 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日本在诺贝尔三大科学奖领域的斩获已经达到 24 人，本土科学家 22 人。对比邻国日本屡屡获奖，诺贝尔奖与我们无缘的根子在哪里？

创新性人才要从娃娃抓起，科学精神、基础科研能力的培养也要从娃娃抓起。实际上，这

也是日本近些年来基础科学研究成就爆发性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日本的基础教育与中国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一样有灌输式、重应试等弊病，但日本早在二战以前就通过大量的教育实验让教育方式有了很大变化，战后日本也在探索中吸收了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与经验。例如，日本的幼儿园、小学并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而是强调儿童的生活经验，日本高中实行学分制，学生有比较大的选课自由。在教师方面，老师也有很大的教学自由，他们可以在大纲的基础上开展因地制宜的课程设计和教学研究。因此很多学生的科研能力进入大学以后就开始脱颖而出。

基础科学教育作为一项极为基础性的工作，它的效果或者是后果要很多年以后才能见到。不过我国青年科研人员的情况，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出一些观察和判断。其存在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大家一边诟病科研体制上的问题，一边普遍忙于发跟随性研究论文评职称、抢帽子，原创性、开拓性严重不足。

在我国的很多科研院所和高校，相关科研团队这些年发在《科学》、《自然》等世界顶级科学期刊上的科研论文也不在少数，但是一般都是跟随性研究或者应用性研究，不管是在这些年十分火热的冷冻电镜技术下的蛋白质结构解析、生物体基因测序、石墨烯还是其他一些新材料研究等都是如此。我们不是说这样的研究不重要，但这种局面暴露了我们在基础性原创科研上的巨大软肋。青年科技人员是我国科研力量的核心，他们的能力也代表着我国的整体科研实力。因此，有一些观察人士悲观地认为，这种局面没有根本性改变，中国原创基础研究领域获得重大成就将会十分渺茫，能够问鼎诺贝尔奖的概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近些年来，随着综合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长，中国开始有了建设世界科学中心的梦想，这主要是世界科学中心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中国科技发展的目标不是获得诺奖，而是要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当前要积极向日本学习，并和日本在亚太进行角逐。我们基础教育体系和科技体制改革中依旧存在的根子性的突出问题，必须要有刮骨疗伤的勇气进行改变才行，如果仅仅是每年公布诺奖时讨论讨论，而后又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摘自 半月谈 2018-10-15）

★ 热点评论

高校千分之一的淘汰率算是“严出”吗

华中科技大学 18 名学生因学分不达标本科转专科，连日来引发广泛关注。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对华中科大此举给予肯定，他表示，天天打游戏，天天谈恋爱，天天浑浑噩噩的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不能搞“玩命”的中学，也不能搞“快乐”的大学，每所大学抓本科教育质量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

在教育部要求高校要杜绝“水课”，严把质量关之后，我国高校开始在“严出”上采取行动。但是，不少舆论担心这是“应景式”从严，只抓几个淘汰不合格学生的典型。我国大学要

普遍实行“严出”教育模式，必须深入推进学校办学改革，为“严出”模式提供制度保障。

每次提到抓大学教育质量，我国媒体都会马上报道大学退学不合格学生的新闻。比如，早在2004年，“上海大学81名学生遭遇退学”的新闻，就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甚至舆论“惊呼”，大学不好混了。可是，从那时到现在，15年时间过去，我国大学并没有建立起淘汰机制，以至于到现在大学淘汰学业不合格学生，还是“大新闻”。之所以存在这一问题，是因为“严出”培养模式缺乏制度保障。

首先是对大学的评价体系，并不支持大学采取“严出”培养模式。当前所有高校，包括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都重视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果，这最具有显示度；在人才培养方面，则关注就业率。而为提高就业率，我国高校不是花精力提高培养质量，而是在就业环节上做文章，具体而言，就是大部分高校的最后一学年，都变为就业年，基本不安排什么课程，就让学生去跑人才市场或者进行就业实习，这直接导致大学教育缩水——本科四年变三年，高职三年变两年。要引导高校重视过程质量管理和评价，给学生完整的大学教育，就必须清理引导高校不重视教育质量的评价体系，其中就包括取消初次就业率统计。

其次是当前的招生、培养制度，不支持高校较大比例淘汰学生。实行严格的培养质量要求，必定要淘汰不合格的学生，但是，不要说淘汰10%的不合格学生，就是淘汰1%的学生（一般地方本科院校的在校生规模都在2万左右，1%就是淘汰200人）都做不到。因为按照我国的大学招生、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制度，一名学生从大三退学，如果想继续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就必须重新参加高考，填报志愿，被大学录取后，从大一重新开始学习。大学退学学生，会被质疑为“不人性”，而这并非大学的问题。

华中科大对达不到本科要求的学生，采取转专科的处理方式，主要就是为被退学的学生考虑出路，如果没有这一出路，家长会找学校求情，与此同时，对大学的质疑也会随之而来，包括大学平时严格要求学生了吗？设置的课程合理吗？2004年上海大学81名学生被退学，就引来舆论质疑，而为回应质疑，上海大学对相关的学生辅导员、学院教学秘书，还有一个学院的领导进行了包括通报批评、降级使用、调离岗位和调整领导班子等的处理。当学生的退学被渲染为教师平时要求不严之后，学校就会在做出退学处理时小心翼翼。

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实行“严出”培养方式，是因为学生被退学后，并不愁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出路，他完全可以再申请其他高校继续学业，因为大学招生实行自主申请制度，随时可接受学生申请转出和转入。而且，退学制度不只是学生不合格被学校退学，还包括学生对学校、专业不满而选择主动退出、转学。我国高校要提高培养质量，就必然会有相当部分学生因学业不合格而被淘汰，但如果被淘汰学生的出路受阻，淘汰就可能只是针对极个别的学生，而且主要是严重违反校规，诸如考试作弊的学生。

当一所学校的淘汰率只有0.1%（2万学生淘汰20人）时，这几乎就相当于没有淘汰。以笔

者之见，我国大学的平均淘汰率应该至少 10%，才能实现提高培养质量的要求，怎么做？这需要推进从招生、培养到管理、评价的全方位改革。（摘自 21 世纪经济报 2018-06-11）

中国大学搞“宽进严出”，可行吗？

根据《长江日报》的报道，华中科技大学在 2018 年有 18 名学生因学分不达标，从本科转为专科，其中 11 人已在 6 月按专科毕业。今年 6 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表示，“有人说，现在是‘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这种现象应该扭转。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中国大学是不是也要搞“宽进严出”了？

“中国高校袋口应扎得更紧些”成为高校和教育部门的共识

很多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现在又苦又累不要怕，考上大学就可以玩了”。有些人确实也是一进大学就“放飞自我”，临到考试再抱佛脚，或者求老师放水给个及格分。很多学校新学期开学选课时，最火爆的话题就是：哪个老师不点名？哪个老师不挂人？有不少在高中拼命的学生，到大学读了四年书，反倒成了废人，不仅智识没有长进，甚至连体能都不如高中时。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怕是也持续不了多久了。

除了华中科技大学“本科转专科”以外，不少大学都有公布，对于学业水平不达标学生，留级甚至退学。对本科教育的严要求，也已经体现在了政策端，被不少学生视作救命稻草的“清考”制度，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此前，若学生在期末考试、补考及重修均未能通过，部分学校会在毕业前安排统一的“清考”帮助学生毕业。

但根据教育部上月印发的《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清考”制度将被取消，高校们也将在今后严把毕业出口关。“中国高校袋口应扎得更紧些”已经成为高校和教育部门的共识。

基于这种现实，很多人都建议，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在高等教育上搞“宽进严出”。

在他们看来，美国顶尖大学学生很少偷懒是因为实行“宽进严出”制度，淘汰率高，迫使学生不敢偷懒。事实上，无论是美国高校“宽进严出”还是中国高校“严进宽出”都存在很多错误的刻板印象。

优质大学一定都是“严进”的

先来说说“宽进”。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优质教育资源都是稀缺的，高水平大学不可能放宽对学生入学条件的要求。在美国，顶尖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学校，入学标准则极为严苛。美国学生要想进入顶尖大学，需要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努力，其辛苦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学生。

当然，美国也有很多可以“宽进”的学校。一些两年制的社区大学，几乎报名就能入学，

许多州立大学，对本州学生的入学条件也放得很宽。所以，美国高校的“宽进”与否是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的，它与学校的性质和等级都密切相关。

中国也类似，大家知道“双一流大学”录取分数线都比较高，算得上是“严进”，但还有一些学校压根无人报考。就算在高考“地狱模式”的河南省，2016年文理科各有一百七十八所院校分数线上无生源，140分就可以上大学。这标准也算宽得不能再宽了。

所谓的“宽进”是整体性的，具体到优质大学，一定都是“严进”的。

真正的“严出”该是什么样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严出”。

毕业率低不代表“严出”，过程严格才是真正的“严出”。很多人一提及“严出”，就是跟“退学”划等号，仿佛毕业率越低，就证明大学在出口关上把的越严。

美国《高等教育编年史》（2009-2010）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率只有57.3%。这被很多人当作美国高等教育“严出”的证据，因为中国绝大多数高校的毕业率都在95%以上。无论是“宽进”还是“严进”，美国大学始终把守着“严出”这一关，但毕业率低和“严出”并不是因果关系。

首先，不同层次的大学具有不同的情况，是不能简单地把所有大学的数据混在一起“平均”计算的。美国学生信息中心追踪了2011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发现社区大学和四年制私立盈利大学的辍学率是最高的。美国教育网站College completion的数据显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校的毕业率，都名列前茅。同时，还有很多美国学生放弃毕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其次，美国大学实行弹性学制，学生可以在4年或更短或更长的时间内完成学业。入校后4年内的毕业率只是一个单独的数据，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比如，斯坦福大学之所以4年毕业率只有78%，并非是由于其毕业标准过于严苛，只不过它的环境和文化鼓励学生创业。而斯坦福大学6年内的毕业率为95%，8年内的毕业率为96%，这些数据 and 北大、清华等国内高校其实差不多。

所以，美国大学的“严出”，并不是一定要让部分学生不能毕业，而是让毕业的学生必须要达到课程标准。以芝加哥大学为例，在本科一二年级的课程中，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都有相应的学分要求。

最核心的是，在学生的选课目录中，小班讨论课必须要达到一定比例。如果说，上大课时学生还有可能偷懒的话，那么，在十来个人的小班讨论课上就无论如何偷不了懒。如果学生不读书，不完成课后作业，不要说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就连讨论都插不上嘴。每一门课的成绩都包括了平时成绩、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只靠期末考试前背背笔记是绝对不可能蒙混过关的。

中国高校肯定算不上“严出”，如今从教育部到各高校都开始重视起来，当然是件好事。

但是，“严出”应该从课程标准上严格，比如教师的PPT不能七八年都用同一套，一些混学分的“水”课该消失就得消失。另外，国内高校善用“数字指标”管理，很可能强行设置淘汰率，毕竟国内曾有名校每门课控制10%学生不及格的规定。

这是一把“双刃剑”，应谨慎掌握，这意味着大家都努力，也有人会被淘汰。这样绝对化的评价显然有失公平，其负面效应可能影响正面初衷。千万不能只从毕业率上严格，硬性规定学校要有多少淘汰率，那只是“换汤不换药”。

大学应该“严出”，但必须做好制度配套

从世界范围内看，大学本不该是这般“好混”。从教育规律本身、高等教育所要体现的含金量来说，大学学习无疑需要学生付出相当精力。但为什么之前很多高校都对学生“心慈手软”了呢？

因为在现在的高考体制下，中国学生读大学的机会成本太高。学生一旦被退学，就相当于一无所有，只能返回原籍，想再读大学，就要重新参加高考。所以，大学在把严出口关的同时，对于学习跟不上的学生，应该有制度配套，以免让他们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

首先，对于学习跟不上的学生，可以建议其转入本校难度更低的专业。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包特就曾介绍说，荷兰很多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如果发现自己跟不上，就转到法学院，再不行就转到人文学科。

其次，可以效仿美国大学之间的转学制度。美国的转学制度灵活性很强，美国高校建立了学分互认制度，学校之间可以转学分。学校的教授在课程开始之前，会给学生发教学大纲，里边写了课程内容、评判标准以及教科书的使用，转学基本是依照教学大纲来审查课程。申请转学时需要参考的资料也比较全面，比如高中三年成绩、个人文书、SAT成绩、原来大学的表现、教授的推荐等。

中国高教体系中应该建立更加灵活的转学、分流体系，通过学分互认、课程共享等方式，给予不适应本校学习的学生再探一条出路、再多一次机会。国内高校也应该更科学的设置本科课程，在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要为本科生上课，在中国，院士给本科生上课会成为新闻。

当然，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推进招生和培养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如果学校还是只能按计划招生并依照计划进行培养，招进来一批学生，最后要保证毕业率，相对而言，就无法做到“严出”。（摘自 腾讯评论 2018-10-18）

★改革探索

上海理工大学：推出师生学术共同体交流计划

教师到境外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学生也能跟着一起去。上海理工大学最近推出师生学术共同体交流计划，为学生随导师出境交流提供政策和经费支持。学生在游学、交换生等形式

之外，多了一种出境交流的途径。

该计划明确，每位教师到境外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时，最多可以带4名学生，学校为每名教师和学生提供最高1万元经费资助，用于在境外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开展3至5周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截至目前，上海理工大学已批准9个团队的出境交流计划，涉及10名教师和24名学生，共资助34万元。

上海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王孟刚与老师从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回来，在国外期间，他协助老师完成了实验仪器搭建、反应舱调试等工作。他说：“这项计划给了学生出国做学术的机会，体验国外的大学生活，了解到国外最前沿的技术，提升了口语等各方面的能力。”（摘自 中国教育报 2018-10-10）

中山大学新办学管理模式：“校办院系”改“院系办校”

10月13日，中山大学2018年秋季工作会议在珠海校区拉开序幕。本次会议以推进院系办校为主题，旨在凝聚广大师生的智慧和共识，推动内涵发展，为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奋勇向前。

13日下午，中大校长罗俊作了题为《聚力内涵发展 推进院系办校 共创一流大学建设新局面》的大会主题报告。罗俊强调，学校要紧紧抓住“双一流”的重要契机，立足学校新时期的良好局面，对标党中央的新精神新要求，精心谋划未来三年的改革发展。2021年，力争稳居国内高校第一方阵，跻身我国可进入世界一流的若干所大学之列，争取“双一流”建设首轮评估排名取得显著进步。他指出，院系办校是适合学校发展的管理新模式，是学校实现新时期内涵发展的重要路径。院系办校是以维护大学完整统一为根本，以发展规划为前提、以责权划分为重点、以资源配置为关键、以学校对院系的考核评估为核心，进一步提高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确保学校事业行稳致远。

罗俊还提到，院系办校是学校办学管理模式的深刻转变，办学主体责任尤其是学科建设的主体责任很大一部分从学校转移到院系，对职能部门和院系领导班子的能力素养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和考验，要求干部队伍要具备忠诚、干净、担当的基本素养，要具备熟悉局面、掌控局面、开创局面的领导能力，要具备有眼界、有胸怀、有追求的领袖气质。

中大党委书记陈春声在闭幕式上发表总结讲话。陈春声在讲话中将中大办学管理模式改为“院系办校”评价为“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做出的战略性选择，是加速学校内涵发展，破解瓶颈难题，打开‘双一流’建设新局面的必由之路，也是学校在深思熟虑后的慎重决定”。

随后，中大各校区的学院、直属系、管理服务机构、附属医院等围绕即将推行的“院系办校”开展工作。（摘自 澎湃新闻 2018-10-15）